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种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古老文化，必有其丰富而又深刻的精神内涵贯穿其中，并成为其生命的坚强支柱。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优秀的精神内涵，这些文化精神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中国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历史发展的思想基础和生命源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实质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第一节 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起源并发展于农业文明，中国古人在农耕实践中需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以“天时”而授农耕时序，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注，于是“天人合一”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精髓。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产生于先秦时期，随后逐渐演化，到北宋时期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提出来了。按照季羨林先生的解释：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和谐共处，尊重自然，而不与自然对抗。“天人合一”的突出特征，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协调。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政治、文化、哲学、伦理、制度等多领域、多层次。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上，中国古代的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和道家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都强调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

道家主张“法自然”。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指宇宙万物都要遵循自然的法则，人也要依循“道”的自然本性，顺应自然规律。

庄子强调顺应天性,“不以人助天”,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处,“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

儒家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德”的精湛的天人合一思想,《易传·文言》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强调人要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也就是说,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要顺时而为、顺势而为,更要顺应万物本来的样子,遵从自然规律,从天而动。《易传·系辞上》记载:圣人立身行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即圣人认为人道与天道是同一的,所以通晓阴阳变化规律的圣人,周知万物的情态,以道匡济天下又能坚持原则,乐天知命而又能发挥德行的作用,制约天地的变化而无过失,成全万物而不会有遗漏。如《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从自然现象的体认中揭示社会人生的玄机。

尊重自然规律,取之有度。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很明了地说明按照自然规律做事的益处。《荀子·王制》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鼯鼯、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①,这实际上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象阐释。《吕氏春秋》则从反面提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意为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违背自然规律,过度索取,自然资源就会耗尽。可见,古代先贤哲人对于自然规律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中所蕴含的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要求人类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反对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人对处理人

^①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1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把天、地和人看作是一个同构的体系,一切社会结构、政治现象都与天相对应;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感情也是依天意而安排的,天人相通,互相感应。董仲舒是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记载:“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并举例说明:“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向了神秘和极端,虽然其中有谬误,但客观上也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

两宋时期,“天人合一”的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并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种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尤其是张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一个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张载《正蒙·乾称》云:“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他强调天人统一,认为人与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其在《正蒙·乾称》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就是认为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大自然看成是人类的伙伴,无疑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的行为与自然界协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恩格斯就认为人和自然界是一致的,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与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①“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而理性是不能和自然界矛盾的”^②“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③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自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性,阐明了自然规律与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揭示了自然过程、历史过程、思维过程遵循同样的辩证法规律的一致性。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正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统一性所决定。由此观之,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的,正如钱穆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点体现了以下基本思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这一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人的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天人的协调,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达到天人和谐统一的境界。自然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人们应根据自然的变化来调整并规范自己的言行。纵观中国的历史,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影响制约着政治,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而它是古代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二节 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把人看作宇宙万物的中心。在天、地、人之间,人为尊,如《说文解字》所言:“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在人与神之间,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确立始终围绕着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展开的,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早在商代就提出“重我民”“罔不为民之承”。《尚书》有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等,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周朝统治者更是形成了自觉的民本意识,如周公提出了“保民”,并反复提出“用康保民”“惟民其康”等思想,又提出要体察民情,“知稼穡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鲜鰥寡”。

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多体现为儒家圣贤思想中。孔子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场,如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始

终将人事和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至于敬奉鬼神之事则放在无关紧要的地位。另外,此时期的《管子》也倡导以人为本,“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左传》中也记载了关于民利及民间疾苦问题,如“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国君是为百姓谋利益,所以国君要亲民,要爱民如子,与民同甘共苦。

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高度。尤其是孟子,在他看来,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只有民众有德,天下才会安定,社会才能发展。他提出了系统的民本思想,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而在这三宝中,人民最为重要,“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即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土地才会有人耕种,国家才能安宁,政事才能取得顺利进展。因此,孟子又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不仅如此,孟子还主张以国民的意见作为评判和决策国事的根本依据,他主张:“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①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思想,认为不能以王道而行的君主是不宜为君主的,将民本思想推向至高点。

孟子之后,荀子也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又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后来的历代君主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重民思想,且出现了一大批关心民众、重视民生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

东汉思想家仲长统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如果人事修正,天下自然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

^①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孟子注疏》,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①如果人事悖乱,天下自然败亡:“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蓄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②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③仲长统非常精辟地概况了儒家人本思想的精髓,后来的进步思想家基本都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

开创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深谙民贵君轻、民水君舟之道,认定“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贞观政要·务农》载,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待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确立,不仅增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有助于抵制宗教神学的侵蚀,使中国成为了非宗教性的国家。佛教传入中国,宣传生死轮回的观念,但是遭到进步思想家的辩驳,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在其《达性论》中批判佛教神不灭论和轮回学说,宣扬人本思想,他认为:“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有生必有死,形朽神消,不可再生,这是自然现象,否定了佛教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神学思想。南朝范缜的《神灭论》更是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进一步捍卫了人本思想。宋明理学同样提倡以人为本,张载主张世界万物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朱熹认为万物是“理”的体现,陆九渊、王阳明则认为万物不过是人“心”的外化而已。尽管他们的思想有种种不同,但是都强调了人的主体性。

直到现代中国,我们依然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主要原因就是民众的支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毛泽东认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⑤毛泽东把民众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当

① 张发祥、柯美成主编:《群书治要》,1810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② 张发祥、柯美成主编:《群书治要》,1810~181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③ 张发祥、柯美成主编:《群书治要》,181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5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初之所以能打败各种势力,走上执政的位置,一个充分的理由便是,它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唯物史观的运用,同时也延续了中国“民惟邦本”“民为贵”的民本思想。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目的都是满足人民对幸福的追求,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第三节 刚柔相济

在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时,每每都总结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中华文化一种隐性的精神,就是“清静无为”的阴柔思想。这种柔性精神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其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如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所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有动静之辩。但是,辩论的结果,还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占上风,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导思想,柔静思想不过是一种补充。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中国文化中主静、阴柔的一面处于从属的地位。刚健有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纲领,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辩证的思想,一直贯穿着刚柔、动静、有为与无为等一系列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思想。儒家的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精神,与道家的“知雄守雌”“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刚柔相济、动静有常、进退有据的文化精神。

首先占主导地位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骨子里就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从神话传说时代就产生了。

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在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我们的先民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钻木摩擦出来的,这说明我们有敢与自然作斗争的自强不息精神。在远古时代,人类都遭遇过洪水的侵袭,但东西方应

对洪水的方式不同,西方人躲在诺亚方舟里的时候,中国的先民用凿山疏导的方式治理洪水,确保百姓安宁。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人有敢与灾难作斗争的自强不息精神。当一座大山挡在了家门前,选择搬家还是移山,中西方的理念是不同的,对西方人来讲搬家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对中国古人来讲,家永远是温馨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属,所以中国的愚公开始移山,且“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人坚信只要持之以恒最后一定会完成移山的壮举。愚公移山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人有与不可战胜的困难作斗争的自强不息精神。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纵览所有太阳神的神话我们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在黄帝时期,因为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河流干枯,百姓热死,于是部落首领夸父开始追逐太阳,誓死要把太阳摘下,最后在奔于大泽路途中渴死,于是有人会笑中国人不自量力,但夸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是有担当的英雄。在另一个故事里,为了拯救被太阳炙烤的人类,后羿张弓搭箭,终于把多余太阳射下来了,只留下一个太阳,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温暖着人间,普照万物生存,人们安居乐业。挑战太阳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人可以输,但绝不屈服。

抛开神话或传说的故事情节,其背后蕴藏着深层次的内核,即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国人听着这样的神话或传说故事长大,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逐渐成为我们的遗传基因,代代传承。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他认为刚毅的表现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张有志向、有德行的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君子要有担当道义,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并且要有理想信念,努力实践自己的人生价值,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态度。上述内容都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

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最经典的表述来源于《周易·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按照一定规律运动,刚劲强健,健动不止,生生不已,君子为人处世,也应效法天,运行不息,修德敬业,不断进步,尤其要发愤图强,刚毅坚卓,不屈不挠,永不停息。在这里,效法天的是人,自强不息的还是人,儒家始终将人置于积极的、主动的、核心的地位。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放在宇宙万物的中心,强调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的旨趣完全一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

秀,最有积极性、普遍性的成分。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旋律,中国传统文化凸显了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革故鼎新、创造进取,即人要向天地学习。

这种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体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历经几千年,在其发展传承的过程中深入人心,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再到上层人物,可以说为全社会所认同,起到了教化民众、激励民心、凝聚民族的重要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经典的记载:“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①反映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上层人士越是遭受挫折越是奋起抗争,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张载曾说,“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意思是要想成功,必须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将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其内心和身体都要经受一番苦难和磨炼,以此来使他们内心警觉、性格坚定、增长才干。经受过挫折,经历过苦难,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才能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5 000年的文明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自强不息发挥了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民族发展都不缺少拼搏进取的精神,但5 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作为中华民族拼搏奋斗的历程和收获,有着自强不息的独特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学,而不是神学;国人相信,命运掌握在不断学习提高、不断拼搏奋斗的人手中,发奋图强、坚韧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勇前行。

曾国藩对自强不息修养的认识富有新意。他要求,人要有一股韧劲,受得磨难,能吃苦,稳得住;必须“从明字做出”,心头要明白,头脑要清楚;慎独是自强不息的关键环节。他还提出自强三原则:主要在自我修养,而不在“胜人”;在修养中,应“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持之以恒也很重要。与古代人相比,近代国人更多地偏重

^① [汉]司马迁:《史记》,33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于思考国家的富强建设问题,寻求国家迅速摆脱困境的富强之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顽强生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反抗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完善自我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勤劳刻苦的美德。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而没有中断,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华民族屡遭异族入侵而不屈服,历经磨难而不倒,靠的也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这种精神铸就了中国人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品格。

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强盛时期起到过巨大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精神成为国人起来反抗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无数的仁人志士奋发前行,不屈服恶劣的环境、势力与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压迫,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时不在体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回顾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我们先民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通过精耕细作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维护,在有限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养活了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口。虽然也饱经战乱、朝代更替,但总体上几千年既没有换人也没有换地,直到清中叶还是信心满满,享受着康乾盛世的太平祥和。但是当古老的农业文明遭遇到了强大的工业文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近代中国开始了令人痛心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历史,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再到辛亥革命不断的探索,这100多年中国人有太多的辛酸和血泪。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屈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困境中走出一条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五次反“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排除千难万险。这些行动汇聚在一起,使中国共产党这股力量成为最敢于斗争、最英勇顽强的中国历史上一支前所未有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实践探索出来的正确道路,是对近代以来100多年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指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往无前,不懈奋斗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自强思想的重要表现,就是坚持独立的人格,崇尚高尚气节,重视使命担当,具有家国情怀。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为了家

国大任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苟且偷生。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①生存和道义都很可贵,但当二者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他认为大丈夫就应该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了照耀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

只要智者中的智者、精英中的精英不甘心沉沦,我们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当我们处在亡国威胁的时候,我们民族的脊梁、社会的精英奋起抗争。比如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无数的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左权、赵一曼等,他们为民族大义与救亡图存,同仇敌忾,前仆后继,舍生忘死,挽救了民族的危亡。

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一直有“南杨北赵”之说,“南杨”指的是在东北东南部抗战的杨靖宇,“北赵”则是东北北部地区的赵尚志。对这两位著名的抗联领导人,日本人恨之入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给日本人有力打击,但由于兵力悬殊,到1940年2月,在日军的疯狂围剿下,杨靖宇身边只剩6名战士,其中还有4人负伤。杨靖宇下令伤员转移,他说“咱们多活一个人,中国就多一线希望,你们就是爬也要爬出敌人的包围圈”,而他只带领两名战士,向着伤员转移的相反方向进发,目的是引开敌人追兵,不久这两名战士也牺牲了,杨靖宇孤身一人穿着被树枝划破的棉衣和一双早已损坏的棉鞋艰难地辗转在深山老林之中,与数百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此时的东北是最寒冷的季节,根据当时的气象资料记载,杨靖宇所处的濛江地区最低温度已是零下42摄氏度。1940年2月22日,筋疲力尽、饥饿难耐的杨靖宇在保安村以西的山里遇到几个打柴人。其中一个叫赵廷喜,杨靖宇请求赵廷喜,“你们几个能不能进村给我买点吃的,再给我买双棉鞋,我多给你们钱。”赵廷喜见杨靖宇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说:“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日本人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是不杀,如果杨靖宇投降,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出任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杨靖宇制服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些细节都清清楚楚地记载在日伪当局的档案资料里。杨靖宇对赵廷喜说的这句话惊天动地,中国人即使剩下一个也绝不屈服。赵廷喜下山后,将杨靖宇的行踪告诉了日本人,最后杨靖宇等来的不是食物和棉衣,而是敌人的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壮烈牺牲。

杨靖宇的老对手,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听说杨靖宇被击毙,下令解剖

^①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孟子注疏》,3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杨靖宇的尸体,他要看看杨靖宇这么多天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当杨靖宇的胃被切开之后暴露出来的只有草根、棉絮、树皮,在场的日本军官都不自主地立正站好,甚至是落泪。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岸谷写了一封遗书,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他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天皇陛下发动这次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岸谷隆一郎最后剖腹自杀。杨靖宇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他的自强不息给敌人强烈震撼。中华民族自古至今就是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①

与儒家刚健有为思想相辅相成的是道家主张的清静无为。但是这种“无为”却不是消极遁世,而是以退为进,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一种人生策略。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他以水为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②水是至柔的,但滴水可以穿石。所以老子认为为人处世要谦虚谨慎,甘居柔弱,又譬之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③他以“不敢为天下先”为人生三宝之一,主张“知其雄,守其雌”,虽有雄健之势,却居于雌柔之地。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人生策略和人生智慧。

道家的“无为而治”“恬淡虚静”等思想对士人阶层的生活、心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儒家救世,道家救心。中国士大夫总是走着入仕以儒、出世以道的路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积极进取时,总是提倡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失势退隐时,便津津乐道于老庄之学,修身养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儒两家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静一动、一退一进,以其鲜明的个性差异,各自为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一个支点,以其巨大的创造力和支撑力,塑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大主流,犹如长江和黄河。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58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②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③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第四节 贵和尚中

贵和尚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它以中庸思想为途径,以和合思想为目标,把统一、稳定、和谐视为最高追求。这种思想理念经过系统化与理论化,成为一种客观的精神力量,使得在这种理念孕育下的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以整体为本位,着力维护整体利益,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以及社会和谐。这种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是极其重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可以说“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缘起性空”的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儒佛相融,佛道相通,儒道佛三教合一,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

和谐统一,提倡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关心,形成友爱互助的人际关系;在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主张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并通过对中庸原则的体认和践行,化解人间的冲突与紧张,缓和人际关系。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构建“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谐,追求人际和合、天人和合、身心和合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

文献记载,第一个谈论“和”的人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不同

要素、元素相配合,才能均衡统一,得到和谐。他认为,五味相和才能产生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的音乐,尤其是史伯把“和与同”提升到了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国语·郑语》中记载了郑桓公和史伯讨论国事的对话,郑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曰:“殆于必弊者也……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①郑桓公问史伯周王朝是否会衰落,史伯的回答是周必定要衰败,原因是周天子“去和而取同”,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和”,即多样性的统一,不同事物达到均衡,才能够促使万物生长,生成新事物。如果一味追求“同”,那就只有量的增长,不会有质的变化,不会产生新事物,发展就停滞了。正如《周易·系辞下》:“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男女是阴阳相对的两极,具有不同的性质,是相互冲突、矛盾的。絪縕、构精,是指天地、男女的阴阳两极融合、结合,然后化生新事物、新生命等和合体。这便是由冲突到融合再到新生命的和合体的产生。由近及远,由男女构精而诞生新生命,由天地絪縕,便生天地万物。史伯作为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对“和”与“同”的认识既深刻又生动。

到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又用“相成”“相济”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将其用于君臣关系和政务处理上,他认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而去其否。”^②即君主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臣指出君不正确之处,以便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样才叫作“和”;如果君认为正确的,臣也认为正确,君认为错误的,臣也认为错误,这叫“同”,而不是“和”,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史伯和晏婴的“和同”思想,总结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即君子很亲和但不会苟且赞同,小人曲从人意,却不能做到中正和平。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遇事以礼为规范,协调各种对立、差异的矛盾因素,使之和谐共处于统一体中,保持事物的稳定。

一直以来,在和合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而不同”是中国人民奉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睦邻友好的积极作用。

^① [春秋]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253页,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

^②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左传正义》,16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与人之间团结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先贤看来,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家庭,乃至个人,最好都要进入“和”的状态,即天和、地和、人和、己和。首先,天地必须要和谐,天地不和谐,万物就很难生存发展。如天崩地裂、海啸地震、火山爆发、大旱不雨、洪水横流,那样就五谷不生、六畜不长,人也无法生存,所以中国人讲的风调雨顺,就是天地和谐。其次,人与人之间也要和谐,古人云:“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上天降下自然灾害,人类还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救灾,但人类如果自己不和谐那就无法生存了。例如,自有人类以来,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仅世界大战就发生两次,人类的自相残杀,使无数人失去生命和家园。另外还有人为的环境污染、吸毒、艾滋病等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伤害,这些都是人类不和谐的表现。中国人讲的国泰民安,就是人与人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最后,个人也要和谐,自己身体里的各种机能恰到好处地发挥作用,六脉调和,身体健康,并且思想上不焦虑、不纠结,即身心和谐、身体健康、人品健全,性格阳光是己和的体现。只有天和、地和、人和、己和,我们的世界才能和谐。

儒家认为“和谐”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太和的状态。《彖传》云:“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就是天地万物最好的和谐状态。《中庸》记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就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境界。北宋理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荡、胜负、屈伸之始。”^①张载认为“太和”就是“道”,而“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也就是说,太和就是最高的理想追求,是整体和谐的最佳状态。太和蕴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相互消长、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和谐,这种“相感”而生万物的整体、动态的和谐,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启示人们要胸怀宽阔、广纳百川,在和谐的自然、社会环境和心态下奋发进取。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各种各样,和就是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到了一起,能够协调和谐,交互共生,彼此促进,这就是中和境界,是中国各派思想家都追求的。道家也主张和谐,《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是道,“二”是阴阳,阴阳交合,即生为“三”,这个化生万物的“三”,就是“和”。老子解释说,万事万物都有“阴”和“阳”两种属性,即所谓“负阴而抱阳”;阴阳二气相互冲突激荡,交互影响,彼此消长,从而达到

^① 章锡琛点校:《张载集》,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一种平衡状态,生成和谐之气,即所谓“冲气以为和”。这种阴阳调和而形成的“和气”,则是万物生成和转化的根本原因和依据,万事万物在和谐中生成,在和谐中变化,在和谐中发展。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早在《尚书·尧典》中就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邦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治四国”,唐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干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在“和合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成为了一个不远征的国家。

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对于解决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纠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必然会引起各种矛盾和分歧,“和而不同”的原则,虽不能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部问题,但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扩而大之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无疑是有意义的。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化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思维。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①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剂。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6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2002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在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说:“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①把君子小人之间推广为社会、国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社会事物、人的处世行事、文明发展的规律、准则和真谛,体现了经典诠释的“与时偕行”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和合文化”始终是家庭和睦、国家统一、人际友善、民族团结、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泉。家庭和睦相处讲求“家和万事兴”,生意兴隆讲求“和气生财”,农业丰收讲求“风调雨顺”,事业有成讲求“和衷共济”“内和外顺”,治国理政讲求“政通人和”,处理国际关系要“协和万邦”,人和自然要“天人和谐”。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何谓“中庸”,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如果说,“和”是最高理想追求,那么“中”就是实现“和”的途径。即要达到“和”的理想,就要持“中庸之道”。“中”指事物的“度”,强调“适度”,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办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也不能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应该是完全合乎标准的中正不偏,准确适度无过无不及,儒家对中庸的最经典的解释来自于孔子师生的一段对话。《论语·先进》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5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①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和卜商这两个同学谁做事更好点儿，孔子回答说，颛孙师做事比较激进，总是过头，而卜商做事优柔寡断，总是不到位。子贡接着问，按老师讲的，那颛孙师还是比较好一点吗？孔子回答，过头和不到位是一样的，没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说中庸不能过头，也不能不到位，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是最准确的度。

事物对立的两端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对立的两个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允执厥中”，即孔子所说的“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

掌握分寸才能恰到好处，就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写：“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就是适度，恰到好处。中庸之道又被比作豪猪哲学，即一群野生豪猪，身上长满尖利的刺，在寒冷的冬天要挤在一起取暖。如果离得稍远，互相借不着热量，但凑近了，尖利的刺就会扎到彼此，经过无数次的磨合之后，豪猪们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距离，那就是在彼此不伤害的前提下，保持着群体的温暖。

孔子的学生子游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数是烦琐、密集的意思。如果一个人总是跟在国君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一个人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彼此疏远也就不远了。人与人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性，都必须相互尊重才行。钱穆先生的解释是事君交友，见有过，劝谏逼促，或过于烦琐，必受辱，或见疏。或求亲昵于君友，以逼促烦琐求之，亦必受辱，或见疏。若依教说义，于君友前数说已劳已长，或数说君友之短及其不是，亦将受辱见疏。

儒家思想中最好解释中庸之道的是《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天下最根本的东西，“和”是天下最行得通的道理，达到了中和，天地作用到位了，万物就健康成长了，这是非常正确的。万事万物都是天地共同作用、相互配合而健康成长的。

《中庸》把中庸之道作为做人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即“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强调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就必须注重自我修养，要克制自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中庸之道渗透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

^①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论语注疏》，1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价值取向上,其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中庸思想的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调和折中的处理方法;二是温良和顺的人格特征;三是重安定、忌动荡的社会心态。中庸思想的正面效应有三个方面:一是辩证看问题的思想;二是主张和平、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三是刚柔相济、有理有节的处世之道,达到行为有致和社会有序。

贵和尚中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生存智慧,也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心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谐精神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贵和尚中”的思想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平和了人们的心理,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对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君子慎独”的自警意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道,“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等。这些宝贵的精神价值,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气度,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在历史的长河中起着教化民众、激励民心、凝聚民族的重要作用,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包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鲜明而远播四方。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已在162个国家(地区)建立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孔子学院自创办以来,累计为数千万各国学员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服务,在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可以说,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走向世界,并且它的“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等思想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思考提要

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哪些?
2. 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想的影响有哪些?
3.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贵和尚中思想?
4.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

本章参考文献

- [1] 陈鼓应注译. 庄子今注今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2] 黄寿祺, 张善文译注. 周易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3] [清]王聘珍撰, 王文锦点校. 大戴礼记解诂.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孟子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5] [清]王先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6] 张双棣等注译. 吕氏春秋译注.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7] 苏兴撰, 钟哲点校. 春秋繁露义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8] [汉]班固撰.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9] 章锡琛点校. 张载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10] [德]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11] 钱穆.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 1991(4).
- [12] [汉]许慎. 说文解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1.
- [13]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尚书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论语注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5] 黎翔凤撰, 梁运华整理. 管子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6]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春秋左传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7] 张发祥, 柯美成主编. 群书治要.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 [18] [宋]司马光编著, [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9] [唐]吴兢编著. 贞观政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20] 李敖主编. 朱子语类·太平经·抱朴子.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
- [21]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2]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 中国文化概论.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23] [汉]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24] [清]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 [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6] 周绍良主编. 全唐文新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 [27]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28]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9] 骆玉明, 刘强. 楚辞选.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7.
- [3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礼记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